

晚清京师同文馆的办学困境与局限

李昕晔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启动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于1862年创办的新式外国语学堂——京师同文馆是洋务运动教育领域改革的重要成果。京师同文馆在其存在的约四十年时间里，在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也引起了不少争论。最有名的争议有二，一是因增开天文算学馆清廷高层展开过一场激烈争论，二是一些知识分子对同文馆的学制、课程、人才培养模式的争论。这两次争议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推动教育改革过程中因自身及保守官僚在思想上的局限性。

一、洋务派与保守派的“中西学之争”

京师同文馆办学之初所开设的课程，只限于外国语言文字，同时学习中文课程，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部分官僚知识分子有机会接触并认识到了西方“数算地理”“声光器电”的先进性，开始致力于推动工业化改革，于是在同治五年（1866年）增设天文算学馆，且招生对象是科举举人、进士及国子监贡生等所谓正途出身的人。此举招致朝廷保守派的批评。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书反对招录正途人士学习西学，认为以升途和金钱诱人学习是败坏气节之事，应当另选能工巧匠专心学习制造轮船洋枪的方法。随后大学士倭仁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学习西学的必要性，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以恭亲王为代表的洋务派称“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又何疑乎？”力图将西学放置在中国传统固有的概念内，强制将西学归纳为儒学的格物致知，以求抗争的理论依据。洋务派一方面必须谋求改革以应对对三十年未有之大变局，另一方面和保守派一样维系着传统的“夷夏观”，不同的是洋务派认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虽然洋务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论以朝廷对同文馆办学的支持而告终，但其完全基于对外交人才需要的功利目的，暴露出对西学持开放态度的洋务派受“夷夏之辨”根深蒂固的影响，未能辩证对待西学与中学之间的关系。虽然最终洋务派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但倭仁等人的言论却得到不少人的同情，也符合当时社会的普遍心态，导致天文算学馆虽然成功开办，却因其教学内容与社会主流的科举正途大相径庭，投考者寥寥无几，就连在同文馆学习的学生也不愿放弃科举之路。曾有八次出国经历并任光绪帝英文教师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认为自己“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作为馆内英文高才生的汪凤藻在两位兄长中举人之后不甘落后，在乡试中一鸣惊人高中第二名，可见“科甲正途”对知识分子影响之深。此次同文馆之争不仅反映出晚清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困境，更反映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待西学非排斥及“强制同化”的认知局限。

二、对同文馆办学落伍的批评

随着甲午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宗藩体制破灭，主权国家概念的植入促使士大夫认识到挽救国家危亡的迫切性。部分持进取态度的士大夫提出“变法自强”的主张，认为振兴国家必须重视西学教育，兴办实业。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后对京师同文馆的批评，正是清季教育制度的变法思想之一。

在京师同文馆办学之初，洋务派在外语教学方面毫无经验可言，天真地以为只要请几个会中文的外国人就可实施教学，在短时间内造就外语人才便可一劳永逸，因此仅招收了十多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进行为期三年的外语培训。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代表清廷对洋务人才的进一步需求，即不仅要培养在外交谈判中传达言语信息的口舌之官，更需要懂得科学和法律的现代外交官和实业家。因此京师同文馆根据不同的培养模式将学生分为两类，一类兼修外语和西学，一类因后开办的天文算学馆招收的学生年龄偏大缺乏外语功底仅修以汉语教学的西学，虽然具备了分科学制的雏形，但实际上学生选修西学的情况并不踊跃。各次（同文馆题名录）的大考榜单显示，分别于1878、1886、1892和1897年进行的四次大考中，每次参加考试的人数平均为102人，而参加西学科目考试的学生平均仅44人，说明有超过半数的学生都不曾选修外语以外的学科。1895年陈其璋《请整顿同文馆疏》中就批评同文馆的水平“在外洋只称为中小学塾，不得称为大学堂”，而其所设科目更是“门类不分，精粗不辨，欲不为外洋所窃笑也难矣”。同文馆虽然规定了学制年限是兼修外语与西学者八年，仅修西学者五年，但事实上在每次检验学习成果的大考后，仅少数名列前茅者被授予品级并担任政府外交职务，导致并未选中的学生在没有合适安排的情况下无法结业并长期留馆，而馆内膏火名额有限同样无法招录新生。学生为寻找出路最终还是放弃西学回归到科举正途，“及即得科第，遂与绝学，终为弃材”。可见京师同文馆无论是在分科学制还是修学年限，以及招生、结业的问题上都未做严格的计划。而对于京师同文馆所培养出来的兼顾西语与西学的人才，维新理论家郑观应、梁启超则认为同文馆所教的不过是初学之皮毛而已，仅能粗通外语的学生根本算不得人才，而且同文馆虽作为外语西学教育为主的新式学堂，缺乏中学教育以立其本，所以培养出来的多数是被洋人招去的买办，不可视为经世致用的救国之材。

上述言论严厉批评了同文馆办学方面的不足，与同治年间保守派士大夫的批评有很大的不同。从前保守派坚持传统的教育观念，对待新式学堂只有排斥和反对，给京师同文馆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后来的批评者们包括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他们本身接触过西学，甚至有过留洋的经历，眼界远在传统官僚之上，他们的批评包含对整个教育与配套的人才选拔体系的具体提议，体现了清末知识分子眼界进一步开阔，完成了从“中本西末”向“中西并用”的思想转变，为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与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结论

京师同文馆从创办到归并于京师大学堂的四十年时间里，朝野对其评价可谓毁多于誉。晚清的新式学堂教育规划发生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中，社会现实对京师同文馆的建设影响极大，使它有很多不尽如人意见之处。诚然，后世评价京师同文馆为中国新式教育之滥觞，但在晚清的社会背景下它始终是游离于中国传统办学体制之外的异类。（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理论

激活红色动能 汇聚精神力量

“大思政课”视域下凝聚高校思政课新发展活力的路径与策略

雷浩伟 郎欣悦

厚植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建设的文化根脉

大庆精神深扎红色文化沃土，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自立自强、敢想敢做、有心有为的精神标识，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明晰了价值尺度和道德要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孕育产生于举世闻名的大庆石油会战，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和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大庆精神在内的红色文化软实力具有鲜明的特征，是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不可或缺的精神特质。“大思政课”要树立“大历史观”，恪守回溯过往、观照当下、放眼未来的“大情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高校思政课建设的底蕴。在质疑中坚守、于困境中奋起是大庆精神生生不息的密码，是文化自信自觉自信的典范。凝聚高校思政课新发展活力，助力其内涵式高质量建设，需从源远流长的文化中孕育自我革命的动能，既要勇于自我净化、自我改造，敢于破除陈旧错误的思想观念障碍、体制机制障碍，还应不忘本心、牢记初心，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大胆回应一切刻意指责和无端讥讽的声音。高校思政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以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基点，善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红色文化资源，是赋能高校思政课以文化人的必行之路。

涵养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建设的理论源泉

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持之以恒地学深用好《矛盾论》《实践论》，是夺取大庆石油会战胜利的法宝，为持续打赢石油生产攻坚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站在高校思政课提质增效新发展起点上，要更加重视理论对实践先导作用的发挥，以理论的回归稳固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支撑力、复原力。大庆精神由“两论”起家、靠“两分法”前进，以及“三老四严”“五条要求”等作风的践行，无不透露出科学理论之于行动的正确指引及其效能转化的价值。

以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学习教育为基础，紧扣高校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这一主线，打通两者工作体系，坚持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科研“目标—结果”导向同以学生为主体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过程—实效”导向相结合，是延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应用场景，提升思政育人针对性、适用性的前提。

贯通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建设的传播体系

从“铁人”王进喜到“新时期铁人”王启民、再到“大庆新铁人”李新民，大庆精神在一代代“石油人”的接力中得

到不断丰富和传承。传播方式和内容并重、形态和功能兼顾是大庆精神愈传愈新、愈走愈强的密钥。高质高效、全员全域的传播为凝聚高校思政课新发展活力提供坚实保障。“讲深讲透讲活”的实质就是通过互动化、场景化、分众化以及规范化、智慧化、生活化的传播策略，将思政之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一方面，要坚持“内容为王”，通过红色文化学理阐释、红色文艺创作推广等红色资源的深度开发运用，进一步推进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将思政育人吸引力、感染力的提升锚定在学术研究支撑、生活案例透视等实体层面，而非单纯地罗列故事、播放视频。另一方面，以全局思维推动高校思政课教材教案、课程课件的体系化建构和完善，尤其要注重理论讲授与实践训练的等教学模式的一体化改进，提升教法教具的协调性、适配性，让核心技术革新成为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建设的活力源泉。

打造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建设的协同平台

丰富旅游参观、理论学习、学术研究、职教培训、师资研修、工作实训等阵地载体，是大庆精神走向社会、面向大众，实现内在精神功能外化的重要途径。凝聚高校思政课新发展活力亦要打好阵地战，发挥其主体联动性、资源聚合性等优势。建好大平台是“大思政课”协同育人实效提升的关键，大庆精神研究机构以及系列育人展馆和研修基地、“大庆精神+”产业孵化园、大庆精神宣讲团等专业化平台的搭建，既为其思政育人营造齐心协力的工作环境氛围，也通过共同体的打造进一步发挥红色文化立德树人的辐射带动作用，助益影响力、塑造力的提升。“行走的思政课”不仅要求教学研修贴近革命遗址、走进博物馆，更为重要的是在沉浸式、情景式的“听—看—触—想”基础上，将阵地所汇聚的红色要素转化为制度规范加以固化，同时因人制宜地活化为师生日常工作学习的素材，使其真正有所得、有所行。此外，要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以阶梯育人的分工协作突破各学段瓶颈，更大范围整合高校思政课新发展活力。

【作者雷浩伟系重庆市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郎欣悦系重庆三峡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任教师；本文系2022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党的自我革命视域下党内法规制度实施机制现代化研究”（编号：2022BS002）、2023年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高校思政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教师思政方向）一般项目“党建育人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师‘六要’素养及教学能力提升研究”（编号：2023SZZX08）理论研究成果，亦为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修基地（大庆师范学院）“老精神·新大庆”主题研修成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创设计创新实践

古那尔·艾则孜

价值与空间。基于此，非遗文创设计的要求更加强调给消费者带来参与体验和情感认同。

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人员应以消费者体验为出发点，依托数字交互技术与游戏化交互设置，充分调动消费者的感官、情感与行为，使消费者在与文创产品的交互中深刻理解承载的非遗内涵。一方面，数字交互技术的运用。近年来，伴随着虚拟现实等多元交互技术的应用，非遗不再是束之高阁的“珍藏品”，而是成为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艺术。消费者通过语音识别、触控行为等交互方式与文创产品深度互动，在沉浸式感受非遗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与非遗的情感联结，获得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比如，平阳木版年画数字文创产品“云游年画”APP，通过年画文化、年画DIY、节日礼物三大模块设置完成产品的交互体验设计，用户可通过主界面的节日提醒、年画刻印DIY、线上分享等方式进行互动。另一方面，游戏化交互设置。游戏化设计不仅可增强产品的趣味性和吸引力，而且可提升用户的参与度，带给用户愉悦的情感体验。例如，近几年爆火的非遗盲盒，其设计人员采用游戏化的创新设计将非遗装进盲盒，使非遗被人看在眼里、端在手上，帮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走近非遗、感受非遗、爱上非遗。比如，浙江励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在第十九届深圳文博会上新推出的一款以青瓷为主题的考古盲盒，便采用游戏化的交互设置使用户在勘探、发掘、清理、修复文物的过程中深刻感受非遗。

基于品牌建设的非遗文创设计创新

打造高辨识度的非遗文创品牌是助力非遗文创产业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推动地方非遗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方式。唯有立足地方特色与消费者需求打造独特的非遗文创品牌，不断提升品牌辨识度，才能建立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深度关系，促进非遗传承。近年来，伴随着文创产业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扩大，诸多文创团队和设计者对非遗文创开发表现出强烈的热情，但由于设计者品牌意识不足、宣传薄弱，且缺乏有组织的生产、营销，市场上的文创产品同质化严重。

非遗文创设计团队应基于非遗特色建立品牌识别系统，并结合新媒体加强非遗文创的品牌推广，打造独具文化特色和市场价值的非遗文创品牌。一方面，文创设计人员可基于地域非遗设计差异化、个性化的文创产品。中国不同地区所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差异，如广东粤剧、上海顾绣、天津泥塑等，这就需要设计人员提炼出不同地域非遗中最具特色的元素，建立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进而提升品牌辨识度，以此建立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联系。比如，法蓝瓷便是依托江西景德镇陶瓷的文创品牌，因独特的产品造型与品牌理念连年获得各种奖项。另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青少年是最活跃的群体，思政课建设要向改革创新要活力。”以改革创新凝聚新发展活力，是持续推动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建设、全面塑造思政育人新优势的内在要求。“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建设应当秉承“大系统观”，从自身主体协作、关系调适、资源配置、环境优化等多方面入手，实现内在发展动力、潜力的整体跃迁，推动形成更深层次、更大影响、更有保障的铸魂育人新发展格局。当前，高校思政课建设既要积极适应和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新发展要求，亦要主动融入和彰显新质生产力的新发展理念，切实讲好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全方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新发展故事，全方位凝聚高质量建设的新发展活力。

百年党史孕育着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建设的不懈动能。发扬自我革命优秀传统，盘活用好红色文化资源，使其成为纵深引领和长远浸润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精神支撑，是提升“大思政课”育人要素运转效率，发挥思政育人铸魂润心实效的关键。鉴觐于大庆石油会战时期，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大庆精神，是新中国工业精神的模范，谱写出使命型政党笃志笃行的光辉本色，为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建设孕育了丰厚的历史养料。凝聚高校思政课新发展活力离不开伟大精神的奠基和蓄能，我们要从包含大庆精神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汲取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建设的智慧与力量，凝心铸魂、守正创新，以更好地驱动高校思政课建设书写新篇章。

夯实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建设的政治基石

坚持党的领导是大庆油田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是加速产业迭代升级的优势和力量所在。爱国是大庆精神的内核，广为传唱的《踏着铁人脚步走》《我为祖国献石油》等“石油红歌”，均宣示和展现出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在大庆精神中实现了高度融会贯通。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有机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作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坚持党的领导贯穿高校思政课学思践悟、产学研用的始终。“大思政课”呼吁站位更高、视野更宽、力度更大的党筑统领“大格局”，要从思想引领、制度保障、阵地支撑等多方面入手塑造高校思政课建设新生态，将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作为高校思政课“政育”的要点，以之突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等方面的综合优势，进而通过坚定政党自信凝聚高校思政课新发展活力的政治基础。

党的自我革命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近年来，“非遗+文创”成为非遗保护传承的新途径，二者的深度融合既可丰富非遗的表现形式，使非遗在传承、传播方面更加生动和直观，也有助于推动非遗的生活化、大众化发展。文创设计人员应在深入挖掘非遗资源的基础上设计出兼具文化内涵与时代气息的非遗文创产品。

基于文化生态的非遗文创设计创新

文化生态，即文化的生态，指文化形成、发展、延续所依赖的环境，以及文化与环境的关系，其中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非遗文创产品作为一种基于非遗的艺术衍生品，承载着深厚的非遗基因，是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有效途径之一。近年来，伴随着文化生态的变化，非遗难以依靠自我创造、发展和调节功能来适应文化生态的演变。基于此，非遗文创产品设计应将非遗置于当代文化生态中，通过对非遗的解构和重构，形成适应当代文化生态系统的非遗属性集。

其一，非遗的解构。非遗蕴含传统手工艺、民俗活动等文化表现形式，是文创产品设计的重要素材和灵感来源。但文化生态系统的演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必然存在与当前文化生态不相适应的元素，因此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人员应站在整体角度深刻剖析非遗与自然、非遗与艺术审美、非遗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并以文化生态适应性为准则对非遗元素进行解构和取舍，以保证文创产品更好地适应当下文化生态。

其二，非遗的重构。通过文创设计对非遗进行重构便是运用打破、转化、重组、叠加等方式对非遗元素进行再创造、再设计，从而获得崭新的表现形式，其核心是在保留非遗基因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表现形式的创新。例如，基于磁县剪纸的非遗文创产品设计“福带”，其设计人员在保留磁县剪纸传统色彩与传统图案的基础上，根据文化生态的变化，转化与重构图形布局和文化元素，并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腰带相结合，既有效突出磁县剪纸的祈福文化，也促进了剪纸技艺的传承。

基于交互体验的非遗文创设计创新

随着消费水平普遍提升、消费需求日益多元，人们不仅注重产品的外观和功能，还注重产品的体验感、交互感和参与感。在此背景下，体验经济应运而生，强调以具体场景和生活为发力点，塑造感官体验和思维认同，以此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改变消费行为，为产品找到新的生存